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三月二十八日)



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是革命党,那就不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有风险的事。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我们遇到的一些风险。我们遇到过什么样的风险,我们的方针是,要冒风险。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看一看,要解决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改革能否成功,再过几年就能看清了。农村的改革,包括城市,农村在内的全面改革更复杂了,我们中间一定还会犯错误,还会出问题。关键是要及时,哪一步走得不要当,就赶快改。最近出现有什么了不起,国际上有人把它看得比较严重,但是总归是好的。两个开放,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两个开放政策的继续,我们要继续开放。不久前,我在全国科技工作会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毛 磊
马德茂
王列平
著

ZHONGGUO
DE
DIERCI GEMING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的 第二次革命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毛磊 马德茂 王列平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毛磊, 马德茂, 王列平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12

ISBN 7-307-02525-6

- I 中...
II ①毛... ②马... ③王...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理论—邓小平
②邓小平—理论, 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
IV D61 F120.3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武汉大学印刷厂印刷

(430072 武汉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1997年12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2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229千字 印数:2001—5000

ISBN 7-307-02525-6/D·366 定价:12.5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胡家祥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这也是向全党发出的伟大号召。为了响应这个号召，就要把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就必须完整、准确地把握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深刻领会，牢牢掌握精神实质。作为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还必须为学习邓小平理论做一些扎扎实实的研究与宣传工作。《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书的出版，就是为迎接学习邓小平理论新高潮的到来献上的一份礼物。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大地相继发生了两次伟大的革命。第一次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中国长期任人欺凌、受人宰割的历史，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又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旨在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障碍的第二次革命，这场新的革命必将把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反复证明：科学的理论根植于伟大的实践

之中，伟大的实践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进行了反复的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光辉著作，从理论上回答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性质、对象、任务、动力、道路和前途等问题，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指导革命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同样不能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开始找到了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胜利前进的法宝。

在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不能称之为理论。这种观点显然是十分错误的。要澄清这种错误认识，重要的是要深入开展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和宣传。邓小平理论的语言朴实无华，但内容丰富，博大精深，需要我们很好地进行研究。深入研究和宣传邓小平理论，帮助人们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这一理论的精神实质，正是我们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方面，我们广大的理论工作者满怀热情，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总的来讲，对这一科学理论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对构建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一系列基本观点的研究方面，更需要加强。

有鉴于此，我认为由中南财经大学毛磊、马德茂、王列平三同志合作撰写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书的出版，正是做了这

样一项十分有益的工作。“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思想，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专著尚不多见。作者在多年潜心研究邓小平同志这一主体思想的基础上，严谨治学，精心创作，使该书具有较高的质量，更是难能可贵。

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落实这项战略任务，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尤其是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拿出更多更好的理论研究成果和理论宣传读物。《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书的出版，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随着我们对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必将会涌现出大批的既有理论深度又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精品。

1997年10月于武昌

绪 论

一、撰写此书的动机

为什么要写一本《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呢？产生创作的动机是什么？或者说撰写此书的目的何在，我们有以下的一些想法：

（一）为学习宣传邓小平的理论做一点扎实的工作

邓小平于1992年初在南方的谈话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许多学者发表论著，高度评价其伟大的理论意义。有的学者认为它相当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当代的《新民主主义论》。^①《新民主主义论》在实现中国第一次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于指导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胜利也必将发挥同样的作用。正如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新民主主义论》之所以产生巨大的作用，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道路、领导力量、革命对象、革命任务以及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刻而又生动的论述。言简意赅，便于为全国人民所理解与掌

^① 《毛泽东思想研究》，第4期，1993。

握。因而一旦被数亿中国人接受后，便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从而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于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性质、动力、道路、领导力量、革命对象、革命前途以及与以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同样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论述，而且深入浅出，朴实无华。但因为具体历史条件不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于第二次革命的上述一系列问题的论述，在文字表达上不像《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那样直接与集中。这样，便给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一项任务，就是把《邓小平文选》中关于中国第二次革命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作专题研究，仿照《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写作方法，对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性质、对象、领导力量、动力、道路、前途等问题作出文字上的集中的表述。给人们学习邓小平理论提供一种辅助读物，为宣传邓小平理论做一点扎扎实实的工作。特别应强调的是，党的十五大决定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中。这就是说每个党员按邓小平理论规范自己的言行，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宣传邓小平理论是每个党员的神圣职责。我们为了尽职尽责写这本书，以求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深入研究中国 20 世纪史的需要

再过短短两年光景，我们就要告别 20 世纪了。20 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巨变的世纪，站在世纪末的近终点，回眸百年风云，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专门研究此课题的学术著作与论文，也相继问世，在可预见的近期内，“中国 20 世纪学”很可能形成一门新兴的学科。仅就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如何分期，在中外学术界已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美国学者杰里特·W·龚格在 1993 年冬季号的《华盛顿季刊》上撰文认为，本世纪中国共进行了四次革命。他在《中国第四次革命》一文中提出：1911 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宪政共和国，是中国第一次

结构性的现代化变革；1949年的毛泽东革命将中国改造成一个人民共和国；50年代的革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78年的邓小平革命通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的第四次革命。这次革命是渐进的、累积性的。^①而国内学者则另有一种划分的方法。如符啸在《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刍议》中提出如下的观点：仿佛是一个巧合，20世纪中国革命的发展恰好把这100年划为两半：前半个世纪（1900~1949年）是战争的世纪，拼搏与反抗的世纪；后半个世纪是和平建设、革新与创造的世纪，是中华民族从贫困走向富裕，从落后走向世界进步前沿的世纪。符啸进一步分析道：仿佛又是一个巧合，中国革命的发展恰好把20世纪的上半叶和下半叶又各分为两个阶段，形成四个在时间上差不多相等的历史时期。如果紧扣革命与革新这一主旋律，可把这四个时期界定为：（1）国民革命时期（1900~1925年）；（2）后国民革命时期（1925~1949年）；（3）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950~1976年）；（4）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976~1999年）。^②还有的学者提出，意大利学者维科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与“凡人的时代”。作为一种参照系，在全新的意义上构造中国20世纪史的体系和框架，也可分作四个时期作如下表述：（1）英雄时代——国民革命时期；（2）人民时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3）第二英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时期；（4）第二人民时代——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有一些分期方法，不再赘述。

对于上述种种分期方法，我们尽管不完全同意，但他们有理有据的分析是很宝贵的，值得学术界关注，而且对于我们研究中国20世纪史有启发作用。本书把1978年后席卷中国的革命称为第二次革命，而龚格则认为是第四次革命，这就有着很大的不同。

① 《华盛顿季刊》，第4期，1993。

② 《东南文化》，第4期，1994。

当然，两者的研究角度不同，方法各异，形成不同的分期。这不要紧，反而促使我们打开思路，扩大视野，更好地研究中国 20 世纪史，从而也可以更好地研究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对于 20 世纪中国史的划分，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上的报告中作出了科学的概括，他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①接着，江泽民同志指出：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十五大报告提出的这个科学概括既为我们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又向我们提出了研究这三次革命区别与联系及它们的不同特征等课题的任务。因而写一本 20 世纪中国的第三次革命即中共领导的第二次革命的专著就是很必要的。

（三）全面系统深入研究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需要

自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科学论断以来，学术界虽然发表了一些论著研究这个问题，但从总的情况看，这项研究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至今还没有一本这方面的专著。广大干部与群众对于第二次革命的学习也不够普遍，更谈不上深入。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许多不健康的社会现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原因之一则是许多人对第二次革命的基本原理掌握得不够。这里仅举一例加以说明：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把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比作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后来发展为三座大山），并以《愚公移山》这个寓言形象地比喻，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像愚公那样挖掉挡在前进道路上的大山。

^① 《人民日报》，第 1 版，1997 年 9 月 22 日。

由于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在思想上十分明确当时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因而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的斗争，把矛头指向三大敌人，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推翻了三座大山。这个历史经验是很深刻的。第二次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呢？我们曾向一些人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大多数都回答不出来，甚至向一些理论工作者提问时也回答不好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既然我国正在进行着伟大的第二次革命，而许多人连革命的对象也搞不清楚，试问怎么能搞好这场革命呢？正因为许多人，尤其是领导干部不明确革命对象是什么，在工作中就难免产生偏差。如第二次革命的对象之一是“愚昧”，正如有的地区提出的：“治穷先治愚。”就是要发展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素质，消灭愚昧才能更好地提高生产力。所以说大力发展教育决不是具体工作如何安排的问题，而是第二次革命的对象问题。许多地区与部门不重视教育，把财力与物力用在其他方面，却不愿向教育方面倾斜。新闻媒体对此作了大量报道，也分析了一些人不重视教育的原因。但多数是一些表面上的原因，抓不住要害。我们认为根本原因是许多人不明确第二次革命的对象之一就是消灭“愚昧”，办教育则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这座新的大山的主要途径。如果人们把办教育提高到是第二次革命的对象之一的高度来认识，就会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正如第一次革命的对象很明确，全国人民真正做到了“人心齐、泰山移”，把三座大山推倒。而对第二次革命的对象不明确，就必然分散力量，不能集中力量用在战略目标上来。正是从这个严重情况出发，我们认为要写一本专门论述第二次革命的书，企图回答一些基本问题。

总之，我们从多方面考虑，认为撰写一本学习与宣传第二次革命基本问题的专著是必要的、适时的。

二、关于第二次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思考

既然是一本专著，就应有自己的指导思想、撰写的体系，尤其应该有自己的见解，能给人们提供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基于此，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力图把邓小平关于第二次革命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阐述准确，这些基本问题有如下几方面：

（一）关于第二次革命的时间跨度问题

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而言的。第一次革命是指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大约用了30多年时间，即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50年代。第二次革命则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将把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大约需要100年左右的时间。

（二）关于第二次革命的性质问题

在党的历史上由于弄不清革命的性质而犯错误的事屡屡发生。陈独秀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当作旧民主主义革命看待，认为既然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就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即国民党来领导，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只是“在野党”，帮助国民党罢了，因而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结果导致大革命的失败。而王明又走向另一极端，把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与将来才能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合并在一起去进行，因而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政治上搞关门主义，犯了“左”的错误，几乎断送了中国的革命。这个历史教训应牢牢记取，我们必须弄清楚第二次革命的性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两个主要的观点：一是邓小平把改革视为第二次革命是对改革的性质

作出的总体判断，就是说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以及由此发生的社会深刻变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是推翻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对此，学术界是没有争议的。我们的第二个观点却在学术界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是，为了推动这项研究的深入发展，我们还是继续使用这个观点，即：第二次革命的性质是新型社会主义革命。而前苏联的十月革命与我国1978年以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则称作原型社会主义革命。新与原的根本区别在于原社会主义革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新型社会主义革命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出这种区分是十分必要的。如1989年的政治风波发生后，有的学者就提出党的中心任务除经济工作外，还应把反和平演变也放在中心位置上。这样，全党工作就有两个中心，而多中心实际上就是无中心。他们之所以提出此问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弄不清新型与原型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区别。我们认为这个区别太重要了。如果说没有新型与原型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那又何必把改革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呢？这个问题在书中作专章论述，此处不再赘述了。

（三）关于第二次革命的对象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第一次革命已推翻了三座大山，而第二次革命的对象则是新的三座大山：贫穷、落后、愚昧。这是本书的又一个重要的新观点，学术界很少有这种提法。但我们认为不明确第二次革命的对象，就不能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中国的现代化就可能再次落空。

（四）关于第二次革命的道路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第一次革命的过程中，经过千辛万苦，付出血的代价，才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艰辛的

探索，找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从而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命题后，究竟走什么道路去完成第二次革命的任务，同样也有一个探索的过程。从1978年起到1992年初，经过13年的反复试验，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为第二次革命找到了唯一正确的道路。对我们的这个观点，学术界也有种种非议。在中国第二次革命的道路问题上，学术界有几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第二次革命的道路；第二种看法是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的道路；第三种看法就是本书的观点，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第二次革命的道路。可以作这样的比较研究，即第一次革命的总道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则是总道路的具体化，没有这个具体化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任务总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而第二次革命的总道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总道路的具体化。没有这个具体化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也无法实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农村包围城市两者看作是中国两次革命的道路，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许多人虽然明确当时的革命性质、任务、对象等重大问题，但对于走什么道路却很模糊，乱冲乱闯，革命屡遭失败。只有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道路，才为党找到了唯一正确的道路。在第二次革命进行的过程中，究竟应走什么样的具体道路，开始也并不十分明确，只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才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为第二次革命开辟了正确的道路。只有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到第二次革命道路的高度上来，才能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明确，行动一致，阔步奔向现代化。

（五）关于第二次革命的动力问题

所谓依靠力量是指第二次革命的动力问题。本书在此问题上，突出两个观点：一是与第一次革命相比，第二次革命的动力更加

广泛。不仅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而且还包括台、港、澳、海外华侨与华人等爱国人士。换句话说，炎黄子孙不论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他们对于振兴中华十分关心，衷心希望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各种形式支援祖国的各项事业。这比第一次革命的动力要更加广泛。本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关于革命的先锋问题。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贫农是革命的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贫农是第一次革命的先锋。而第二次革命的先锋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应是：知识分子、劳动模范、先进人物等。

(六) 关于第二次革命领导核心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第二次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第二次革命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了保证党的领导，必须把党建设好。第一次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正因为这项伟大工程搞得好，才取得了第一次革命的胜利。党中央根据这个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提出了把党建设好的新的伟大的工程。也只有把这第二个伟大的工程搞好，才能领导第二次革命取得胜利。否则，第二次革命就可能半途而废。这决不是耸人听闻，而是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高度概括。

(七) 关于第二次革命的目标、任务及其长期性、复杂性与曲折性的问题

这次革命的任务与第一次革命相比，可以说任务艰巨得多，因而所需要的时间也很长。在这个长期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仅80年代就出现了两次风波，一次是1986年底和1987年初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另一次是1989年初的政治风波。在未来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可能出现风浪。但我们认为不管再大的风浪，只要我们按照邓小平关于第二次革命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去

实践，就一定可以在惊涛骇浪中乘风破浪，绕过各种暗礁，胜利到达彼岸。但必须有应付各种困难曲折的充分思想准备。有没有思想准备是完全不同的。有了出现复杂局面的充分准备，就会做到处惊不变，应付自如，胜利渡过难关。如果认为第二次革命是一帆风顺的，像北京东西长安街那样笔直和平坦，那将是很危险的。第一次革命经历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到胜利的曲折过程。而第二次革命的道路更长，任务更艰巨，情况更复杂，要想不出现曲折，可以说是一种幻想，或者说是一种幼稚病。我们不是算命先生，也不可能预见到将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大风险，但有一条是可以断定的：即第二次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同时，还有一条也是可以断定的：即前途是光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第一次革命的胜利，也一定可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第二次革命的胜利。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的报告中指出的：“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但前面的路并不都是平坦的，还会有各种困难和风险，包括可以预料的和难以预料的，来自国内的和来自国外的，经济生活中的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无论什么困难和风险，都不能动摇我们对邓小平理论的坚定信念，而只会使我们更加自觉地运用这个理论去克服困难，战胜风险，胜利前进。”

三、第二次革命理论的形成过程

邓小平关于改革是“一场革命”的新思路，在改革实践的发展中不断地丰富、深化。1984年10月6日，他在谈及农村改革的深刻意义时指出：“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①这一新认识，是邓小平从农村短短几年的深刻变化中看到了改革所起的巨大作用和新的希望，是他敏锐地抓住了这一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深刻变化的实质，那就是只有将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改变旧面貌。邓小平的这一新提法，从根本上否定了过去农村中所搞的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强调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任何靠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最终只能导致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农村改革中率先实行的生产责任制等措施，事实上就是将农村生产力从过去那种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广大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正是基于对改革认识的不断深化，同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前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又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①此时，他已将改革是“一场革命”的新思路，由过去的粗线条，逐渐加以清理、升华，使之更加明晰、条理、深刻。

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第一次用准确概括的语言，表述了中国目前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刻内涵。他说：“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②此后，邓小平对“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重大命题又进行了多次论述，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③“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④在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如果没有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对改革是“一场革命”的新思路进行

^{①②③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82、113、142、1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